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在医学人文领域有诸多思考。2003年,时任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的王一方称自己“被媒体推着走”,比较完整地思考了SARS暴发事件透露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等的关系,并在当时接受本报采访时谈了他思考的结果。

10年后的今天,王一方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说:“我经常在回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令我痛苦的,从来就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如果我们还仅仅把SARS当做一个科学事件就很轻飘,我们要关注幸存者,反思苦难,要让苦难成为我们灵魂提升的动力。”

我们要配得上这苦难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是一种逃避

《中国科学报》:SARS过去整整十年,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你是怎么思考这一事件的?

王一方:应该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学者反思了一些问题,至少不是轻率地、单一地看问题。

那时我认真地读了不少书,作了一些研究,有了一些思考。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人与自然等的关系,或者只把SARS当成科学史的事件,就没什么意义了。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

王一方:首先,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在现场谈。

其次,那时的情况逼着我们去思考,有语境。现在语境没有了,就是一个他者的话题。

10年了,如果思考的海拔没有提上去的话,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最近很多人在说SARS,我感觉许多内容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

而且,仅把这一事件变成科学话题就很轻飘,从科学角度谈SARS只会谈得很浅。

《中国科学报》:你能否解释一下,SARS成为科学话题就很轻飘是什么意思?

王一方:SARS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事件。如果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就会让人们觉得如果

技术提升了,或者注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类事件——这是误导,是一针麻醉剂,而且是不可靠的麻醉剂。

当人们认为只要继续沿着技术的路走就可运行时,科技就成了人类逃避的通道,从技术角度“逃避”。

许多人很乐意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他们会认为如果手段多一些,苦难就会少一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算不是SARS,还会有别的什么超级病毒或者超级细菌,同样会惊扰人类。这就是人类过度地使用抗生素后,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技术的代价或者技术的报复。

《中国科学报》:你说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什么才是真正面对呢?

王一方:如果将SARS作为一个技术事件处理,而不把它看成精神的炼狱、灵魂的煎熬,我们在经历苦难时如果没有留下灵魂的印记,那苦难就白受了,白经历了。

我们应当更多地去反思灾难,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造成现在不能深入研究并思考这一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王一方:没有新的证据出来,到现在冠状病毒还没有搞清楚从哪儿来的,一直是一个谜,正式的科学渠道没有解释。

非正式的科学渠道倒是有很多说法,像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说得挺到位的。另一个是美国研究者认为SARS是一种基因叛乱,但也没有绝对的证据。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刘易斯就曾讲:“病毒就像一个设计师,病毒也管不住自己,在复制过程无法控制自己的路径,会出现变异,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无奈。”这样来讲,只是讲一个诗意的故事,而且都是十年前讲过的。

反思苦难首先是面对

《中国科学报》:如果我们的思考还一直停留在十年前的,确实没什么意义,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谈SARS呢?

王一方:要从幸存者的角度谈,他们有很多的苦难。当时的治疗方案有三种后遗症:肺纤维化、骨头坏死、抑郁症。严重的人三种后遗症都有,晚景非常凄惨。

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最让人震动的,其实他们被社会遗忘了,这非常不应该。去年的护士节,吉林省长春市一位副市长专门把长春市的幸存者找来,他们中有许多是护士。

《中国科学报》:当时也有很多医护人员失去了生命。

王一方:是的,像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护士王晶等医护人员,为了SARS没有任何的迟疑。在SARS期间,没有一个医护人员逃离,没有一个退却。如果重新说他们的故事,重新讲这段历史,可以弥补医患关系。虽然现在有医生做得不好,我们的医生在关键时还是会冲上去的。

《中国科学报》:关注幸存者,关注苦难,就是你前面所说的现在反思灾难的意义?

王一方:对。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是讲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么长时间西方国家的学者一直在反思,而我们某种意义上是有些缺乏的。

苦难记忆,应该要不断地去咀嚼它。人必定要经历苦难,我们要让苦难成为灵魂提升的动力,而不是让灵魂堕落的缘由。

SARS事件的哲学拷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要如何去反思苦难?

王一方:首先要把事情搞清楚并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去杜绝影响因素。其次还要宽容。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情况不明的恐惧、医疗的无奈,每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都在受煎熬,这种煎熬就是苦难的感觉,牢笼一般的感觉,经历了这些,人们才会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可贵。

苦难是人生最大的导师,不能在苦难面前交白卷,让我们真正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把苦难变成财富。回避苦难或者把苦难轻飘化,那么苦难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令我痛苦的,从来就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我经常回味这句话。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人对灾难反思得不够?

王一方:这30年中国快速发展,人们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感,包括我们这代人对苦难都不愿意面对,SARS唤起我们对苦难的记忆。

因此,这一事件应该成为哲学、伦理学的拷问。这种拷问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风险的,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只有穿越苦难才知道什么是幸福,才知道什么叫快乐。

我们现在对食品、环境、垃圾、水等问题有诸多抱怨,可有多少人真正身体力行节水了?没有自我克制和没有牺牲的精神,怎么去面对苦难?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抱怨,把苦难的命交给别人。

没有深淵感,没有对苦难的理解,没有进入到哲学层面上,苦难就变成只是吃了一点皮肉之苦,然后就忘了。苦难的记忆能让人的灵魂成长,从这个角度去挖掘才有意义。

SARS 让我们反思科学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瑞典病理学家 Folke Henschen 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中几次大的传染病深深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进一步解释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国内学者从不同领域作了反思,同样的,科学人文学者也对科学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反思。

时隔10年,我们回顾当时,再次聆听身在其中的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

自然的报复

SARS带给人们最大的提示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局限。

原本人们认为细菌病毒在抗生素时代完全是可克星的,结果SARS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克星,不知道其发病机理,也没有有效办法去应对。

在控制SARS疫情的发展上,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派上用场,真正让SARS得到控制的是传统的隔离方法。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致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谈到SARS时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定能够实现。”

“现代技术是一个网,让我们想从中反叛都无可凭借。”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在谈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时说:“现代很多技术哲学家一再呼吁技术时代的危险,但危险并不在于环境灾难、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对于危险本身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有危险。”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曾撰文说要反思科学:“抗击SARS、防治传染病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一时还跟不上。人类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到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文明的前途。”

对于SARS这场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呈现出这么恶毒的效果?思考结论还是因为人类自己。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对环境的侵入,二是抗生素的大量使用。

尽管不清楚SARS病毒来自哪里,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导致原始自然环境的日益缩减,生物物种的减少,人类势必侵犯了许多病毒的藏身领地,迫使它们显露出来,从而侵袭人类。

这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敬畏自然”。

美国思想史家纳什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

人们尊重万物,敬畏自然。

刘华杰认为,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不会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20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刘华杰说。

共生还是战胜

除了敬畏自然,“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也要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王一方加深了对“敬畏”的理解。

其实人和细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破坏了这一平衡。

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刘易斯曾说,其实微生物的世界跟人类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

我们没有重视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学者给的答案是:不要妄想把细菌全部消灭。

著名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谈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时说:“人类、微生物及其他生物都是在这个自然界共存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说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依然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因此,“在自然界,这个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体里边,但是它又不侵袭另外的一些人体,当所有这些生态改变的时候,必然要产生新的疾病,所以说传染病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实际情况”。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SARS后,谈到过细菌的启示,认为“细菌的不可毁灭性”是其特征之一。因为“细菌具有别的生物不可匹敌的生命力。它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很低,地上天上水中土中无所不在”。即使“发生核战争,在毁灭人类的同时还将毁灭脊椎动物,但是大多数的昆虫能够幸存下来,核武器更奈何不了细菌”。

面对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刘华杰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也就是说,要调动自身的免疫力。

既然是共生关系,那么抗击SARS疫情时,我们应把“微生物世界的病毒”当成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敌人,这矛盾吗?

王一方认为不矛盾。他说这是事情的两面性。这次病毒闹了祸,就必须杀毒,必须限制它。“大趋势是共生,个别问题上还是抗击。或者说,从整体来讲,大的关系人与自然、微生物是要共生的,但具体到这次SARS病毒的出现,那就是我们要战胜的敌人。”



右上图:1918年“大流感”中的西雅图。

右下图:1921年鼠疫流行时,在哈尔滨指挥防疫的伍连德博士(坐着)。

左图:1918年“大流感”期间将厂房改成病房的壮观场面。

传染病改变历史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英国社会的威胁也大为降低,而这也使得霍乱有了“伟大的环境卫生改革者”的称号。

疫病的预防和控制

除了SARS,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

“天花、鼠疫、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都在近现代大规模暴发过。清末,由于牛痘接种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国的感染率已经很低。所以,近现代中国面对的最主要的传染病是鼠疫和霍乱。”李玉尚告诉记者。

而其中,1910-1911年东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的不时流行并没有促使政府把预防和控制疾病作为其职能之一”。

虽然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国内政的情况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陆军医学校长伍连德主持防疫的决定,但自此以后,由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在中国成为惯例,卫生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不过,那时对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的控制,主要还是采取在易发时节施行预防注射的措施,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说。

新中国成立后,霍乱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已经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胁。

在李玉尚看来,这些疾病与人类活动和环境密切相关,所以非常难以根治。但他认为,建国后政府对它们的控制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同为传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乱、SARS,也因人们对传染病认识的逐渐改变而遭遇着不同的抵抗。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虽然会根据疾病最主要的特征为其命名,但一般来说,还是会不同的传染病全丢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对民众而言,高传染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是细菌或病毒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瘟神作祟。”